



人心不是铁 宪法如洪炉

■ 本报评论员：余凡

宪法法院(MK)于10月16日受理民间提案,让未满40岁但曾担任民选地方首长的人士能成为正副总统候选人,迅速为吉布兰(Gibran Rakabuming)铺垫好政治捷径,成为普拉波沃的副总统搭档。不过,因为触碰宪法和普选规则,故招至法律界及民众的质疑。

普拉波沃-吉布兰于25日根据宪法法院(MK)开启的绿灯,在数名联盟政党首脑的陪同下,到普选会(KPU)正式登记。《独立网》26日报道,宪法法院名誉委员会(MKMK)主席基姆利(Jimmy Asshiddiqie)表示已召集9名宪法法院法官,“不久后即进行调查,有时需要9人一起参加,有时单独或两人,也可能5人一组,全看审查的需要做出决定。”

《罗盘网》31日称,MK-MK已对3位宪法法官完成闭门对话,基姆利说:“关键是,我们发现了很多问题,单单从3名法官,就吐露出了那么多。”“有些表白让我们流泪。”他不愿透露调查的内容,“对法官的实质调查,请大家等候名誉委员会的最终评审。”

11月7日,普拉波沃及其联盟的支持者聚集在宪法法院大厦附近,表态支持宪法法院院长安瓦尔(Anwar Usman),也对MKMK施压,不得撤销“40岁以下可参选”的判决。

《点滴新闻》(detikNews)于11月7日报道,名誉委员会(MKMK)进行调查后,宣布宪法法院院长安瓦尔在总统候选人年龄限制判决案中触犯法官伦理,所以决定撤销其院长的职务,但仍然保留宪法法院法官的身份。名誉委员会成员瓦希杜丁(Wahiduddin Adams)表明,安瓦尔固然犯错,但依法不能由MKMK所罢免。“虽然名誉委员会有权维护宪法

法院的荣誉、名望、尊严,检验宪法法官的道德和行为。但无权评价或更改宪法法院做出的判决。”

瓦希杜丁重申,名誉委员会在宪法上对于宪法法院并没有法律优越性,“名誉委员会不能以其优越地位压制宪法法院的独立性,不能干预宪法法院已做出的判决。”

“MKMK拒绝对90/PUU-XXI/2023这事件通过审理进行修改,甚至取消。”希望社会大众能明白。

《罗盘网》于8日称,安瓦尔认为MKMK的判决及社会民众的指责是对他无情的诬蔑,在与记者简短的讲话中说明17点调查事项时,至少8次提到了“诽谤”,“有关第90号判决书,对我的诽谤是冷酷的侮辱,而且完全没有法律的根据。”“作为即将任满退休的法官,我绝不会为了协助某个候选人得以参选,而牺牲自己的前途、尊严和荣誉。”

安瓦尔透露,早在名誉委员会成立之前,他就听到风声,自己将成为判决案“政治剧本”的目标。“虽然得知有设局想毁掉我的前途,但我仍然以积极的态度看待,作为一名穆斯林,我应当维持在上苍指引的道路及特定的思维。”把自己安排在“道德”高点。

他也指责民众以宗教主张评价他和家人。“如今,我40年来担任国家法官的荣誉、地位和尊严,被冷酷的诽谤弄得毫无价值。但我绝不会感到怯懦或退缩,只为了能在这可爱的国土上树立法律公正而奉献一点力量。”至于宪法法院对“未满40岁可参选正副总统”的判决是条件规范,没有触及具体的法律问题,而且得经过9名宪法法官集体审核,而非院长自己决定的。他也提醒,决定总统候选人能否当选的关键因素是人民的选票。

专家评论,安瓦尔的自辩并没有揭示宪法法院评审的实情,反而引来各类媒体舆论反弹。明朝冯梦龙《警世通言》名句:“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意指任你心如铁石,始终逃不出洪炉似的法律。试问安瓦尔法官,他真的依法办案吗?MKMK及专家们冤枉了他吗?

宪法法院名誉委员会虽然不能免除安瓦尔的宪法法官职务,但限制他在剩余的任期内不得参与有关正副总统候选人及大选事务的审理,这多少让法律界人士感到稍微平衡。宪法法院9名法官9日举行协商会议,因两名法官将退休,5名法官不能或不愿竞选院长,最终提选苏哈托约(Suhartoyo)为新任院长,而沙尔迪(Saldi Isra)仍任副院长。

国会第一委员会(Komisi-I)于8日与武装部队司令(Pangab)的质询,来自斗争民主党的议员乌杜德(Utut Adianto W)提问,在2024年竞选过程中,武装部队及国家警察能否维持中立? 依宪执法而不偏袒某一组候选人? 考虑到最新的竞选动态,引发各界关注。

《国际日报》于11月11日报道,佐科维总统9日在普哇卡卡(Puarwakarta)县视察时,回应记者对宪法名誉委员会(MKMK)判决的提问说:“那是司法权威,我不想发表更多评论,我再次重申那是司法的职权。”众所周知,宪法法院院长兼首席大法官安瓦尔是佐科维总统的妹夫,而第90号判决书的受益者是吉布兰,总统的确处于难以开口的尴尬。

古训曰:“法立于上,教弘之于下。”法律由上层制定,要靠下层官员教化使之普及。坦白说,所谓“人心”总免不了徇于私情,很难把希望全寄托在“法立于上”!但愿更多爱国而正直的人士,共同树立国家宪法的“洪炉”,教化底层民众别沦为“蚕蛹”……

保卫祖国的战士

■ 迪迪·瓜尔塔纳达 (DIDI KWARTANADA)

在日常生活中,华人和人经常被分为两个彼此分开的实体。这种说法经常出现在民间的传说中,它说华人不敢打仗。即使在今天,当大众媒体展出具有华族背景的士兵或军官的身影时,许多人仍会惊讶。

历史背景

18世纪,爪哇包括爪哇国王,总是蔑视华人。在荷兰记载中,当马打兰王国苏苏胡南·巴古布瓦纳二世(Susuhunan Pakubuwana II)得知华人居然敢攻打巴达维亚(1740年)时,他甚是害怕,因为在爪哇,大家都认为“华人被视作女性一样,很懦弱,只适合做生意或当收费站的收费员”(Nagtegaal, 1996:221)。

他们对华人有个刻板印象,即“胆小鬼”,华人不敢拿起武器上前线打仗——这显然是仍然通过口头流传到20世纪一位来自东爪哇的传奇政治人物,鲁斯兰·阿卜杜甘尼(Roeslan Abdulgani)说道,小时候,母亲用爪哇语演唱道德教义的歌给他听,歌词写道:

**用稻草绑着冰块
光头的华人不敢打仗**

一位资深艺术观察家,少年时期在东爪哇罗戈占卑(Rogojampi)观看的首德鲁克(Ludruk)表演中听过这首歌,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2013年7月18日与Agus Dermawan,通过电子邮件获得该信息)。请注意,在20世纪60年代,这首歌仍有人传唱,令这首歌在爪哇人群中重新流传开来。

通过这些民间传说复制的刻板印象没有历史基础。相反,历史数据和记录提供的是与事实相反的信息。其实华人已经掌握了军事科学,包括武术和军事技术(枪支、大炮等等)。

17世纪上半叶,华人已经在军事和技术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当马打兰(Mataram)部队于1636年袭击吉里(Giri)时,苏南·吉里(Sunan Giri)在恩德拉塞纳(Endrasena)的指挥下得到250名华人射手的帮助。安东尼奥·赫德(Antonio Hurdt)对谏义里(Kediri)的最终包围并成功俘获了敌军。其中一位是华人司令员,他与特鲁纳贾亚人(Trunajaya)并肩作战,负责处理枪支。华人除了在经济生活、贸易、政府中发挥作用外,在军事领域也起积极作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武术专家,例如印尼拳术(Pencak)、迪比(Thipie)游戏、何时及如何使用棍子。关于此事,我们查阅许多参考文献,文献中记载了华人与爪哇岛北海岸酋长们之间的冲突(1691-1693年)当中已有熟练战斗华人的身影(Kasdi, 2003:306-307; Carey, 2008:32)。

华人重要的军事行动是他



海军科研参谋人员:(后排右)罗伯特·林·布迪安塔拉 (DIPLING. ROBERT LIEM BUDIANTARA),(前排左)李基祥海军上尉 (KAPTEN IR. SAMRI LEMAN (LIE KIE SIANG)),(前排右)陈绵祥海军上尉 (KAPTEN IR. GHANDA WINATA (TAN BIAN SIANG))

们与爪哇军队结盟,于1740-1743年对抗东印度公司(Kongsi Dagang Hindia Timur, 简称VOC),也就是被称为“华人抗争”(Geger Pacinan)事件。战争的根源系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对华人屠杀,这令荷兰东印度公司徒增许多麻烦。幸存的华人逃往东部,与同样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政策不满的爪哇人(马打兰王国)结盟。苏苏胡南·巴古布瓦纳二世(Susuhunan Pakubuwana II)一开始是站在反对荷兰东印度公司这一方,但后来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结盟。事实证明,华人——爪哇联盟能够击溃卡塔苏拉(Kartasura)的巴古布瓦纳二世王宫,并任命马斯·伽兰迪(Mas Garendi)为国王,即苏南·库宁(Sunan Kuning)。荷兰历史学家诺尔鼎(Noorduyin)(1987:271)说得对:1740年是“爪哇大部分地区一系列长期战争的开始”。(详情参见本部分的《关于华人抗争的编年史叙述》)。

到了21世纪,人们认为印尼华人与军事分离的看法仍然很强烈,如下所述:

历史上,印尼国军和华族的关系确实不太好。九三零事件后,华人被怀疑是共产党派来的代理人,于是他们就不得不经历与其他前印尼共产党干部相同的命运。区别在于,特别是对华人而言,这种共产主义偏见与种族偏见是一致的。而华人,不论他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还是信奉伊斯兰教,都必须放弃他们本身的文化。

这种歧视蔓延到印尼国军招募中。据说,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华人被招入军事学院(Akademi Militer)就读。如果在军队里当医生或工程师,这是有可能的。不知这样的情况会持续到何时(Saragih, 2012, 斜体部分来自笔者)。

上面的摘录似乎不明白那些在印尼国军具有医学背景的

“确实存在”,并且为数不少,并非“可能有”。2013年12月有报道称,印尼国军司令穆尔多科(Jenderal Moeldoko)将军任命一位具有华人血统的一星军官担任印尼国军健康中心(Pusat Kesehatan)主任。

这篇简短的文章描述华人青年们参与保护祖国的活动。几名华人青年通过层层艰难的选拔进入国家军事学院、海军军事学院、空军军事学院学习。他们当中一些人拥有良好的职业生涯并成为印尼国军高级军官。本文还特别介绍他们在军队医疗服务方面的服务。

海军

比起其它兵种,华族在印尼共和国海军建军初期就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今,印尼海军有李约翰(John Lie)(1911-1988年)的身影。甚至后来,现代战舰也以这位国家英雄的名字来命名。

1946年6月的某一天,印尼共和国海军总参谋长M.巴尔迪海军上将(Kepala Staf Umum ALRI Laksamana III M.Pardi)接见一位名叫李约翰(即约翰·李清泉,John Lie Tjeng Tjoan)的年轻客人。李约翰一听到苏加诺和哈达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这位正在中东航行的船员就希望能马上回国。返回后他立即申请加入新成立的印尼共和国海军。于是M.巴尔迪(M.Pardi)和李约翰之间有如下的对话:

“李约翰,你加入海军,希望得到什么级别的军衔?因为你的经验很丰富。”

李约翰答道:“我不是为军衔而来,我这里是来为海上作战,因为这我拥有的是一般海上的经验和知识。”

接着,通过萨赫兰海军上尉(Kapten Saheran),李约翰获得了成为印尼海军一员的决定书,同时被任命为三级军官。那时军衔被称为“三等海员”(Matroos Derde Klas)。尽管只是三级军官的海员,但那里许

多军官向李约翰讨教各种海事知识。

对于李约翰来说,军衔级别不是他特别关心的问题。像革命开始时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的其他年轻印尼人一样,他们都有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捐献的精神。约翰·寇斯特(John Coast),一位在革命时期就认识李约翰的英国人这样评价:“他是一位爱国的印尼人,按族群成分他是一名华人,按宗教信仰来看他是一名基督教徒,但是李约翰是最后一位而且是最勇敢的日惹(译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舰队的舰长。”

按照纳苏蒂安(A.H.Nasution)(1988)大将军的观察,李约翰的成就“在印尼海军里无人能比”,是在共和国的生存面临最严重的危机时的舰队司令;他参与平定“南马鲁古共和国”(Republik Maluku Selatan, 简称RMS)叛乱的行动,“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Pemerintahan Revolusioner Republik Indonesia, 简称PRRI)叛乱行动以及“全面人民斗争”(Perjuangan Rakyat Semesta, Permesta)叛乱行动(见Resume Pendapat, 2009)。通过这些行动,人们认为李约翰捍卫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完整性。李约翰逝世后被安葬在雅加达卡里巴塔英雄墓园(Taman Makam Pahlawan, 简称TMP)。为了表彰李约翰的功勋,2009年印尼政府授予他“国家英雄”称号。五年后,KRI战舰命名为“358李约翰战舰”(KRI John Lie 358)(详情见本部分的《李约翰》)。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几位年轻的华人跟随李约翰(John Lie)的脚步,从印尼海军学院(Akademi Angkatan Laut)毕业,成为军官。包括陈科栋(Ch. Tan Ko Tung)(1960年)、陈彦(Tan Jan)(1961年)、郑甘兴(Yopie The Kan Hien)(1965年)、郑德良(The Tik Li-ang, 印尼文名 Pratiknotedjo, 1965年)和陈友山(Tan Jou San, 印尼文名 Jus Kristanto, 1966年)。还有一位印尼海军飞行员叫洪安敦(Anton Ang)(Santosa, 2014:204-205)。20世纪70年代,在海军陆战队中也有一位华人军官。在东帝汶的军事行动中,“这位军官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在每次战斗中都勇往直前……但很可惜,这位军官在一次近距离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一位认识李约翰的前海军参谋长贝纳·庚·宋达(KSAL Laksamana (Purn.) Bernad Kent Sondakh)这样回忆道。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

事在人为

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值得期待

■ 国际锐评

11月10日晚,中国国家大剧院,一场纪念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50周年的音乐会在这里举行。当融合西方与中国交响乐的《唐诗的回响》唱起,一座心灵之桥也在中美人民之间架起,续写了“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友谊”。

从历史到现实,中美之间有一千条理由把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关系搞坏。在民间交往升温的同时,官方交往也在提速。外交政策磋商、海洋事务磋商、气候变化会谈、军控与防扩散磋商,新一轮经贸对话……中美近期一系列交往对话,发出了稳定双边关系的积极信号,也为中美元首下周的旧金山会晤打下基础。

这是两国元首继去年巴厘岛会晤后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双方将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世界期待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聚焦合作、谈出成果。

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会晤,“重回巴厘岛共识”是关键。过去一年中美关系之所以遭遇困难,原因就在于巴厘岛共识没有得到落实。美国当政者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采取了错误的对华政策。今年上半年,从上演“气球政治秀”,到纵容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过境”窜美,再到实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美方一系列行径背离两国元首共识,损害中方利益,打断了中美对话进程。

从6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开始,美方表现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姿态。美方应该意识到,对华遏制打压行不通,办不到,解决气候变化、地区热点乃至美国经济复苏等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绕了一个大弯,美方不得不回到巴厘岛共识和议程上来。

重回巴厘岛共识,关键在于行动。这其中,台湾问题是中美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近期美方再次作出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不支持“台独”的表态。另外,美方官员多次表示“不寻求同中国脱钩”,认为美中经济脱钩会给“两国和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些表态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转化为行动。

但同时,人们看到,美方依然在操弄与台湾问题相关的法案、向台湾地区售武;依然以“国家安全”为名打压中国。就在上个月,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收紧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规则,并将13家中国企业管制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里。美方应当改弦更张,不折不扣地落实美国领导人对华作出的政治

承诺,不玩火、不折腾。

世界还期待,中美通过旧金山会晤进一步正确认知彼此,理解对方的发展对于自身的意义。“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在中方看来,中美两国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互利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但美方错误地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从“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政策三分法到“投资、结盟、竞争”的三点论,不变的是背后的霸权逻辑与零和思维。

但是现实呢?在刚闭幕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美国联邦政府首次以官方名义参展,参展的美企超过200家,规模创下历届之最。这充分说明:中美利益深度交融,谁也离不开谁,谁也改变不了谁,谁也不必取代谁。怎样看待中国?美方应从“意识指导型”转向“务实指导型”。正如前不久美国加州州长纽森访华时所说,“中国越成功,我们就都会越成功”。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三分之一,人口总数占世界近四分之一、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巴厘岛会晤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应从把握世界大势的高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什么是世界大势?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期待,搞集团对抗与圈子政治不得人心,也没有出路。人们也期待,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就世界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进行的深入沟通,让世界安心,令全球受益。

一直以来,中方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近半年来,习近平主席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加州州长纽森等各界人士,与美各界友好人士互通书信,持续引领中美关系发展。“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必然,“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等论述,引发两国广泛共鸣。

这次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进一步体现了中方的诚意以及对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高度负责。希望美方跳出大国竞争的思维窠臼,摆脱国内党争和政客私利的影响,真正从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对世界负责的角度,与中方开展理性务实的对话,并做好“全过程管理”,以诚意对诚意,以行动对行动。中美关系能否持续“稳下来、好起来”,事在人为。